



开发西北、关注教育的 倡导者、践行者

——余天休教授生平与著述辑要

序 言

郝宏贤同志编写的《开发西北、关注教育的倡导者、践行者——余天休教授生平与著述辑要》，篇幅不大，是一本使人感动的书。这种感动源于深厚的同胞之情、校友之情、爱国之情。这本书通过对具体事实的叙述，对这三种感情做了淋漓尽致的抒发。

美籍华人余天休教授是中国社会学初创时期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关注西北、关注教育，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1920年余天休教授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回国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学。1921年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学学术团体和第一份社会学学术研究刊物。1922年提倡“殖边运动”，主张“复兴西北”，组织相关人士来西北考察。1929年来陕担任（北伐战争时西北大学

改称) 西安中山大学校长, 写成《社会学大纲》一书; 时兼陕西省政府顾问, 经常深入郊县考察乡间疾苦。早在 80 年前提出“开发西北、关注教育”的观念, 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先声, 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胡余锦明女士承扬父亲“关注教育、开发西北”的宏愿, 2000 年以来在甘肃、贵州等西部省份连年捐资建校、救助贫困学生。特别是 2007 年捐资 70 多万元建立“西北大学余天休助学金”, 2008 年捐资 10 万元建立“西安胡氏慈善教育助学金”, 体现了余教授父女与西北大学和陕西的不解之缘。从余天休教授在美学成回国执教, 提出开发西北到他亲赴西安担任校长、推进西北教育, 返美后建立中美学院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从胡余锦明女士在西部省区捐资助学到她出资修建陕西抗日军人中条山英烈纪念碑, 搜集 800 壮士勇跳黄河抗日史料编写爱国主义教育书籍, 体现了一代又一代海外华人关心祖国命运, 投身祖国建设, 期盼祖国统一、富强的拳拳爱国之心, 浓浓报国之情。

我长期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为余天休教授上世纪 20 年代担任过西北大学校长和其

女儿胡余锦明女士至今关注西北大学建设感到欣慰。这里要特别提出,被其父女爱国事迹所感动的郝宏贤同志,依据胡余锦明女士提供的基本材料,广泛寻搜、反复考证,编写的《开发西北、关注教育的倡导者、践行者——余天休教授生平与著述辑要》一书,真实地反映了余教授的学术生涯和恤民思想,反映了胡余锦明女士的善行义举和爱国情怀,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受助的大、中、小学贫困学生了解余教授父女高尚人格和思想情操不可多得的读本。

因兹,欣然为序。

张岂之

2009年6月6日

序言 / 1

第 1 章 家境与幼年时代 / 1

第 2 章 留学时代 / 4

第 3 章 回国任事时代(一) / 7

第 4 章 回国任事时代(二) / 11

第 5 章 致力中西文化交流 / 16

第 6 章 著述概要 / 20

第 7 章 《社会学大纲》辑要 / 26

第 8 章 《经济学原理》辑要 / 29

第 9 章 《世界联邦政府》辑要 / 34

第 10 章 学术与思想 / 39

第 11 章 社会政治理论 / 44

第 12 章 建设新中国理想纲要 / 47

附录 承扬父亲宏愿 资助西部教育 / 51

后记 / 68

第1章

家境与幼年时代

余天休,1896年7月25日出生,即前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时。其时为我国内政外交开始剧变之秋,也就是甲午中日海战后二年,戊戌变法前二年,庚子之乱前四年。这种历史剧变对余教授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父余治中,为旅美华侨;母亲邓氏,亦岭南望族。岭南在宋元以前地广人稀,其气候温和,农产丰富,近六百年来人口渐众;近百年来,则更人烟稠密,生存维艰。加之国内政治不良,人民不但没有受到政府恩惠,反而遭到残酷剥削。每年都有几十万人迁徙海外寻求生路,单余氏宗族侨居南洋、美洲就有几千人之多。岭南北界大山,东南临海,山明水秀,是我国历代个性较强,不愿接受封建政治恶劣势力统治者的世外桃源。居住在这里的人民性格刚直,勇敢而好动,善冒险而多智。自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以

鸦片交易打开我国门户之后,这里成为与外洋文化接触最早的地方,远渡重洋到海外闯世界的人最多,感受近代新兴文化接受其影响的人也最多。因之近百年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领导者,大多是广东人;广东人也遍布全世界,不管你在南洋、非洲、欧洲、南北美洲,都能看到他们的存在。然而旅居美洲的华侨,则是以籍贯为台山、新会、开平、中山诸县的人最多。余教授是台山县获海区上湾村人,余氏宗人众多,聚集在一起形成村落居住的人有好几万人。他们的先祖是宋代不满意当时社会政治现状而从中原迁到岭南居住的人,至今已有 20 多代。经历几百上千年,特别是明代以后,逐渐移居新会、中山、台山诸县,以聚居台山县的人最多,所有氏系族谱及祖先祠堂均在这里。

余教授兄弟三人,其为长;二弟天暖,侨居美国;三弟天乾,早已逝世。余教授自幼与母居家,一切家用均由寄居美国的父亲接济。自六岁起,余教授就学乡塾。但那时乡间教书,老师讲解得少,每日仅背诵四书五经若干页而已。余教授天资聪明,每次考试必列前茅,所读之书均能背诵。但乡间新书缺乏,知识浅陋,只有高小地理课本,使其极感兴趣。除读书外,还参与农事活动。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时到邻近丘陵放牛,有时上山砍柴以供家用。每年秋冬之交,常协助奶奶利用收割稻子之后的空

地,种植一些青菜;除去自己家用外,还将余下的菜挑到集市零卖。余教授在乡间读书七八年,因无名师指导,苦无新书可读进步甚慢。这个时期和其他乡间少年一样,对于国家社会、政治问题不知不觉。

然而余教授从岭南粤海民风浓郁的环境长大,思想意识和性格特点无不受其鲜明影响。他体质虽不强健,然而精神甚佳,能吃苦耐劳,起居有时,每晚至午夜而睡,清晨即起。不喜欢烟酒,不去娱乐场所,不浪费时间。唯喜欢阅读,喜欢访友,喜欢思考,喜欢写文章,此外别无嗜好。余教授个性甚强,情志操急,态度爽直,忠诚而可靠,勇敢而好动,不说谎,不失约,敢说公道话,敢主持正义,敢为天下先,有军人之风度;处事泰然,对事慎重而有耐心,每商诸亲友而后行;肯牺牲,待人平和而有礼,有政治家之风度;不贪功名,不慕富贵,交友不弃贫贱,只求同道,有豪侠之气概;中年以后,则致力于道学,研究有素,动态为之一变,行事不露锋芒,颇有道家之仪表。

第 2 章

留学时代

1908 年余教授遵从父命,与堂兄会合赴美。其时是光绪末年,辛亥革命前四年,年仅 13 岁。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国旧金山组织同盟会,参与者有黄芸苏、崔通约、赵煜、黄伯耀、马超群、李公协等人。余教授与这些革命先行者为伍,是参与工作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同盟会当时办有华侨学校,黄芸苏、崔通约等人担任教师,倡导革命理论,晚上他就在这所学校学习。由此受到革命思潮影响,爱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也即萌芽于此时。

余教授到美国后,所上的正规学校亦甚复杂。初为工业预备学校(Cogswell Polytechnic College),学习木工、铁工、绘画等技术,再拟入陆军学校,后因故中止。这几年间,学术志趣也很复杂。最初对地理很感兴趣,经常购买地图、地理书籍,凡是国内出版的地理书籍差不多都要买来阅读。当时旧金山有两家中国书店,其经常流连于此,

特别注意最新出版的地理书籍,而以先睹为快。余教授记忆力甚强,对世界地图更是记忆极清,随手拿起粉笔就能在黑板上任意绘画各国地图。继而对历史产生兴趣,尤其对世界史演变最为关心。不仅经常大量购买历史书籍,并且课余之后,整日流连于各旧书店翻阅历史书籍。倘若遇到好书,必定买来阅读、收藏。余教授喜欢藏书,在其青少年时代遇书必购,但因迁居及旅行损失的书籍也不在少数。上世纪20年代其由美国返回祖国任教时,除历年遗失的佳本之外,运回的书籍尚有几十大箱。唯中年以后,因忙于奔走国事,且行踪不定置书较少,然所收藏之书,每年也以百计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余教授本拟回国从戎,旋以大势急转直下,于是离开旧金山到美国中部报考大学。1912年考入凡尔巴来素大学(Valparaiso University)攻读法律,1916年毕业。后又到美国东部东缅因大学(University of Maine),学习社会、政治、教育、经济等学科。1918年转入麻省(马塞诸萨州)克拉克大学研究院(Clark University)继续深造。自余教授进入大学学习、研究,到离校回国计有九年时间。在此期间,除攻读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教育学正科外,还选读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功课,并且各具相当功底。同时还抽时间利用万国函授学校(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学习农业知识。

余教授在美国留学 12 年,除精通英文外,尚初通日、德、法、意、拉丁等语言。曾获法律、教育、文哲等专业学士学位,心理与经济学硕士学位,连年荣获清华奖学金和克拉克大学研究院学员奖学金及研究员奖学金。1920 年获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及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年仅 25 岁,是当时我国留学生中获得博士学位最年轻的人。

余教授学生时代除专心读书外,比较注重参与实践,“时向驻美华侨演讲时局趋势”。他经常利用假期在美国各地旅行,尤其对参观新工商业设施最感兴趣,深入观察,开阔眼界。还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活动,不时以英文在美国各种报刊发文畅论时事,向中外人士宣讲中国维新问题。191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趁机提出二十一条,重又占领中国山东半岛。对此余教授无比愤慨,当即发表用英文写的《从法律观点上透视山东问题》一文,阐述日寇强占我国领土的非法行径,激起旅美华侨及美国友人对日本列强极大愤慨。余教授不仅满腹经纶,学识渊博,而且热血爱国,执言仗义,实为我国当代有数之学者。

第3章

回国任事时代(一)

1920年夏,应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之邀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是当时同事中最年轻的教授。余教授从美回国时由上海入境,正好这时孙中山先生在上海著述其建国方略,三民主义诸书,劝他留在南方共事。因与蔡校长有约在先,谨允留沪数周,乃于秋后北上,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学原理,与陶孟和成为最早在中国讲授社会学的人。余教授著有《社会学大纲》一书,先以讲义供教学使用,1931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发行;《社会文化研究法》《人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等书,也都在北平出版。此外著有《社会学导言》《社会学原理》等书,尚未正式出版。1922年2月,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学会并担任会长,这是我国社会学学科第一个学术机构;还创办中国社会学杂志社并任社长,主编《社会学杂志》双月刊,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亦为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定期刊物。该杂志先后出

版了三卷 11 册,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学术建设奠定了基础。此后二十余年,余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法政大学(后改为北平大学法学院)、农业大学(后改为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九一八后迁至北京的东北大学、平民大学以及河北法商学院、齐鲁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过齐鲁大学社会经济系主任)之外,还受聘担任上海大夏大学法律系教授、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广东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等职(但均因事未能到任),为中国早期的社会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余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最初只能以英语授课。由于离开中国时间较长,除熟悉家乡话和广东方言外,不谙北方语言。刚到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校长会见时,是由在北大政治系四年级读书的族人余文铨作的翻译。但其语言领悟速度很快,等到第二年已经能用国语讲课了。几年以后,对各地方言更是有了深入了解,只要一听某人发言的口音,就能准确判断出他是哪里人,此足以证明其极具语言天赋。

余教授不仅是中国早期社会学教育事业的重要推动者,而且也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从事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不独长于理论,而且关注实际民生。常谓“中国边邑沃野万里,山河清秀,森林茂盛,可以开矿,可以畜牧,可以垦殖,可以发展商业,然而人口稀少,平均每

方公里不及一人;而东南沿海之区,则人烟稠密,生存维艰,一治一乱,循环不已,今后欲解决中国之人口问题,必须移民实边,复兴西北。一则可以巩固边防,二则可以厚利民生,一举两得,实一至善之策也。”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1922年创办殖边协会并任会长,提倡推进“殖边运动”,同时编辑出版殖边周刊,为开发西北作宣传活动。接又创办边语学校,约请当时在北平南苑驻扎的西北边防督办兼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将军出任该校董事长,聘请蒙藏语言专家教授蒙藏及其他边疆语言,培养开发西北的基础人才。为使西北开发落在实处,时常在北京组织西北旅行团,约请各方面专家学者前往实地考察,且曾亲自参与指导,制定开发西北的计划。毫不夸张地说,余天休教授是我国近代史上倡导开发西北的先驱者、践行者。

1923年余教授正值28岁,深感国家百废待兴,必须造就大量人才方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遂将边语学校改为北平私立东方大学,担任校长期望以此校为基础,训练各方面人才,作为开发西北的骨干力量。毕业于东方大学经济系的著名画家董寿平先生是当年东方大学学生会负责人,1984年回忆北平“三一八”惨案时,还谈到校长余天休,说他当时在学校讲授新社会学,非常关注现实和贫苦群众,在余教授影响下当天东方大学就有100多名学生参加了请愿游行。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定,东方大学教学很

难正常开展。1924 年以后,国共两党出现合作局面。特别是 1925 年北伐革命开始,国民革命军从珠江打到长江,再打到黄河,节节胜利,有志青年皆去南方从军,受时局影响东大校务进展极为缓慢。看到这种情况余教授即于 1927 年夏天,将东方大学与畿辅大学合并,改名铁路学院。1936 年七七事变发生,铁路学院校务也全部停顿。值得一提的还有余教授原为华侨子弟,长时间居住国外,对于华侨情况极为熟悉,1925 年杨晟任旧北京政府侨务局局长,曾聘其为该局顾问,余教授对如何做好侨务工作也贡献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东方大学合并、停顿后,余教授于 1937 年秋转赴上海,与同乡冯仲拔合作,在沪执行律师职务,兼任国际电讯社总编辑,主编英文《时事评论周报》。在此期间,适逢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日寇出兵占领山东半岛。余教授遂用英文著述一书,名为《日本对华之冒险行动》,阐述日本对华侵略野心和其必遭失败的论据,在海内外轰动一时。此书由国际电讯社出版,销路极广,后因先生赴西北任西安中山大学校长,未能再版发行。

第4章

回国任事时代(二)

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率部南下,参加第二期北伐。余教授赶到南京与冯将军会见,旧友重逢,相谈甚欢。冯将军兼任甘肃军务督办,特聘余教授为顾问,邀其赴军中辅佐。次年余教授旋与友人马鹤天同赴甘肃。途径西安时,适逢冯玉祥部下宋哲元将军在陕任省政府主席,和余教授交谈极为投机,执意恳求余教授留在西安,聘其为陕西省政府顾问,并担任西北大学(北伐战争时改称西安中山大学)校长。余教授把在陕任职当作开发西北、关注教育的绝佳机会,不仅加强西北大学学科建设,整饬校务,还经常深入郊县农村,体察民间疾苦。针对当年陕西遭遇大旱,不少学生因经济困难申请休学,余教授提出8条学生贷款办法,经省政府同意通令各县遵照执行,帮助困难学生继续上学。余教授女儿胡余锦明女士至今保留着他在西北大学当校长时的一些照片,其

中一张是余教授和几位老乡的合影，呢子大衣上落下一层黄土。

余教授在西北大学任职时，针对当时国内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不多，社会学教材极为缺乏的现状，根据自己讲授社会学十多年的积累，着手编写《社会学大纲》这部专著。在1929年7月14日写的《自序》中说“今春余出长西安中大，于公余之暇，将社会学之要旨现编成大纲，以便一般学子之参考，但暇时不多，随时即写，全部各章次序亦未完全规定。兹将已成之部，现行油印200余份，分送各知交，请为指正。俟全部大纲告成之后，再将内部各章次序重新规定，以便再版。”《社会学大纲》一书，后来作为当时高校社会学专业通用教材，1931年在北京正式出版。缘于其父在西北大学的这段工作经历，2007年10月，胡余锦明女士与西北大学签署“余天休先生助学金”捐赠协议书，每年资助西大60名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学生每人3000元，首期四年完成，共捐助人民币72万元。西北大学校长孙勇高度赞扬胡余锦明女士继承和弘扬其父“开发西北、关注教育”理念的善行义举，把当年余教授亲笔题名创办的校报《西安中山大学日刊》赠送胡余锦明女士。胡余锦明女士也把余教授33岁任西北大学校长时的照片和翻译的《道德经》英译本赠交西北大学收藏。

1929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南京举行陆军编遣会